

环境史探索丛书 | 第一辑 | 总主编 梅雪芹

环境史研究叙论

梅雪芹 著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本书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环境史研究与20世纪中国》
本书出版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
同时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0



环境史探索丛书
第一辑
总主编 梅雪芹

环境史研究叙论

梅雪芹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环境史研究叙论 / 梅雪芹著.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1.12

(环境史探索丛书)

ISBN 978-7-5111-0855-5

I. ①环… II. ①梅… III. ①环境-历史-研究-世界 IV. ①X-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1802号

责任编辑 马琦杰
责任校对 扣志红
封面设计 彭 杉
版式设计 彭 杉

出版发行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00062 北京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16号)
网 址: <http://www.cesp.com.cn>
电子邮箱: bjgl@cesp.com.cn
联系电话: 010-67112765 (编辑管理部)
发行热线: 010-67125803, 010-67113405 (传真)
印装质量热线: 010-67113404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1年12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60千字
定 价 34.00元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总 序

环境史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环境史是怎样兴起的？环境史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如何把握环境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环境史研究的意义体现在哪里？等等，是我们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探讨的一些问题。这里，谨从一本书谈起。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 1907—1964，一译蕾切尔·卡逊）出版了一本被认为是“现代环境运动”肇始的书^①；书中开篇描述，人类可能会面临一个鸟儿不见、植物枯萎、鱼已死亡的破损的世界，这即是《寂静的春天》。该书所描述的这一世界前景，既是作者“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②，又是对其所处现实中的真实情况的反映。这种情况，也同样是在美国各地和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因滥用包括杀虫剂在内的各种化工产品而破坏自然并危害

①[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前言”，第12页。

②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译序”，第1页。

人类的实情，可视为现代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和教训的缩影。^①卡森的著述则对这一文明及其“征服”自然的基本观念提出了挑战，因此，甫一出版，即在美国朝野上下引起轩然大波，尤其受到了利益攸关的生产与经济部门的抨击。与此同时，该著作的思想价值也不断为人所认识，并获得高度的评价。其中，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 1948—）关于《寂静的春天》改变了历史进程的说法^②，可谓至为深刻。自这一著作问世以来，世界历史确然出现了某种转折性变化。人类社会空前正视伤痕累累的自然，以至“自然的终结”、“自然的死亡”、“地球的末日”等这类既略显夸张又不乏洞见的语汇所反映的环境危机的事实，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应对。从学术

①关于现代工业文明的问题和教训，还可参见以下文献：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Environmental Issue Report No.22: Late Lessons from Early Warnings: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1896-2000,” Copenhagen, 2001. http://www.rachel.org/lib/late_lessons_from_early_warnings.030201.pdf; [美]威廉·M·埃文，马克·马尼恩：《危机四伏：预防技术灾难》，刘杰等译，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年；[美]罗伯特·埃米特·荷南：《借来的地球：15起世界环境灾难的教训》，晨咏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

②戈尔说道：“《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现在还没有开始。”见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前言”，第9—10页。关于《寂静的春天》与环保运动的关联，还可参见美国环境史学家威廉·克罗农为一本书所写的序言；这本书是托马斯·邓拉普主编的《滴滴涕、寂静的春天和环保主义的兴起：经典文本》，该序言题为“《寂静的春天》与现代环保运动的诞生”（William Cronon, “Foreword: *Silent Spring*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Environmentalism,” in Thomas R. Dunlap, ed., *DDT, Silent Spring, and the Rise of Environmentalism: Classic Text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8, ix-xii），以及余凤高的《一封信，一本书，一场运动——蕾切尔·卡逊诞生一百周年》（《书屋》2007年第9期）。

界来看，当自然因历史发展而危机重重并被形容为“死亡”的时候，一门“关于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处位置的历史”^①，则日益兴盛起来。这门历史即是环境史，是历史工作者在环境危机和环境运动的驱使下倡导“一场针对环境的行为革命”^②的结果。它在人们认识并宣告“自然之死”^③的当代，恰使得自然在历史学中获得了新生，从而带来了历史观念的种种变革。这是史学在最近的一个世纪之交出现的重大变化，值得我们倍加关注和重视。

在环境史研究所带来的历史观念的变革中，最引人注意的，恐怕莫过于对历史研究对象或题材之认识的变化。

历史研究对象或题材问题，属于历史认识论或史学认识论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什么能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什么又成为

①环境史的重要开创者和领军人物、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 1941—)的说法，见唐纳德·沃斯特：《环境史研究的三个层面》，侯文蕙译，《世界历史》2011年第4期，第98页。

②环境史的冠名者和开创者之一、美国历史学家罗德里克·纳什的说法，出自其撰写的《圣巴巴拉环境权利宣言》，见Roderick Nash, *The American Environment: 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Conservation*, 2nd edition,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 Co., 1976, pp. 298-300。

③“自然之死”或许可被视为对现代环境危机的一种比喻。这里只是想藉此表达人们在环境危机冲击下，对自然的命运的关切之情。自然当然不会为人类所杀死，也不会终结。人类能够灭绝一些物种，破坏一些环境，甚至最终毁灭自身。但是自然，作为一个宏大、复杂的系统，在人类诞生之前便已存在；纵使人类从这颗星球上消失，它也将继续运行。对于这一状况的生动描述，可参见[美]艾伦·韦斯曼：《没有我们的世界》，赵舒静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年。此外，这里的思考也得益于与中国人民大学侯深博士的讨论，特此致谢。

了历史研究的题材呢？纵观中西史学，不难看到，历代史学家和思想家通过具体的历史研究实践以及专门的历史理论或历史哲学思考，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诸多回答。人们对此进行归纳，大体分之为“人事”说、“人类社会”说、“人类社会关系”说、“结构”说和“综合”说等^①。这反映了不同时代史学家和思想家认识并解释历史的不断努力，由此历史研究的对象得以不断扩大，逐步深入。其变化轨迹大体是，从帝王将相和英雄伟人扩大到一般人民，进而包括劳动群众或弱势群体；从政治进入经济，再到社会、文化，乃至出现“总体”考察的诉求。这样，历史也就从反映帝王将相和英雄人物的政治军事活动的“政治叙事史”，发展到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②这种演变，是在历史本身发展过程中，历史研究主体对历史上的社会现实及其所处的当下社会现实的认识不断变化的反映和结果。^③

史学的上述变化，在凸显阶段性差异的同时，也延续着一个基本的共同点：人们一直强调，史学的任务在于揭示人及其构成的各类群体的活动和行为，这也可简称为“人类事务”（human affairs）。从西方史学来看，有人认为，无论是古典时代的人本主义史学还是中世纪的基督教史学，乃至18、19世纪的“科学史学”，其目的都是为了解释和总结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因此，史家孜孜以求的目标，即是为了充分“揭示人类

①参见刘大年：《论历史研究的对象》，《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马寅虎：《历史研究对象认识线索初探》，《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宁可：《什么是历史？——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二》，《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

②当然，史学的变化或一部史学史，并非这些门类的线性的交替变更。这里旨在勾勒其发展的主线和趋向。

③参见徐国利：《对史学价值观与历史本体体现关系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4期。

活动的足迹”^①。在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历史研究中，无意识的实在的自然只是人类活动的舞台或背景，其本身难以成为史学的题材。^②到20世纪30年代，柯林武德在论述“历史学的题材”问题时还确然地说：“对于那不是经验而只是经验的单纯对象的东西，就不可能有历史。因此，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自然界的历史，——不论是科学家所知觉的还是所思想的自然界的历史。”^③同样，尽管中国社会历史很早就讲天、地、人所谓“三才”，但近代以来，自然在中国史学中也不是一个鲜明的历史主题。于是，无论在政治史、经济史，还是在社会史、文化史中，历史舞台上的主角都是人，是面孔不断变换的人。读这些历史，你感觉不到大地的存在，闻不出花儿的芳香，听不见鸟儿的鸣唱。^④

随着环境史的诞生和发展，现代史学中人类独舞的历史格

①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台北：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8页。

②当然，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大都有一个从“神的世界”到“人的世界”的转变，这是历史认识史上的伟大进步。人类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历史，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此处得益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瞿林东教授的指点。

③见柯林武德著、扬·冯·德·杜森编：《历史的观念》（增补版），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8页。同时，柯林武德本人在宇宙学理论史领域有广泛的研究，他还以“自然与心灵”为名，在1934年、1935年和1937年做过有关宇宙学理论史的演讲。他去世后，该演讲稿于1945年由其好友诺克斯编辑出版，这即是《自然的观念》一书（中译本由吴国盛、柯映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

④沃斯特在《自然的丰饶》的自序中谈起学生时代所读历史时，做了这样的回忆：Donald Worster, *The Wealth of Natur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Ec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局被打破，过去只是作为背景抑或完全缺失的自然，终于得以进入前台，与人类一道上演着历史话剧。这自然，“它包括地球，连同它拥有的土壤和矿产资源、咸水和淡水、大气、气候和天气、生物，即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动物和植物，以及最终来自太阳的能源”^①，它们是独立的实实在在之物，是我们赖以生机的一个更大的生命世界。构成这个世界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还有土壤、水和空气等等，皆因环境史家的关注，日益成为了历史研究的合理对象。如今，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围绕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一主线，你就完全可以研究并撰写一部你喜欢的任何自然之物的历史。因此应该说，环境史出色地扮演了史家为之设定的“努力要使历史这门学科在叙事上比其传统具有更大包容性的修正者的角色”^②，这使得历史工作者不仅可以“制造路易十四”^③，而且可以“加工三文鱼”了^④。正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人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了尘沙（土）的历史、空气的历史、火的历史、物种的历史、草地的历史、森林的历史、河流的历史……甚至令人生厌的病毒和流

①[美]J.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梅雪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

②唐纳德·沃斯特：《环境史研究的三个层面》，《世界历史》2011年第4期，第97页。

③“制造路易十四”系英国著名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1937—）的新文化史代表作的书名，该书着力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公众形象的制作、传播与接受的历史（[英]彼得·伯克：《制造路易十四》，郝名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④“加工三文鱼”系美国学者约瑟夫·泰勒的环境史著作的名称，它探讨了太平洋西北部三文鱼渔业危机的漫长而复杂的历史（Joseph E. Taylor, *Making Salmo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Northwest Fisheries Crisis*,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9）。

感的历史。^①这意味着史学题材的极大丰富和更新。

史家这样转换题材，其变革意义非同小可。由于三文鱼原本属于自然的物种，而非人类的创造，对其的研究本属于鱼类生物学家或自然科学家的任务，因此，一贯着眼于“路易十四”之行为并以“制造路易十四”为己任的史学，本来是不关注三文鱼等自然物种的命运以及自然本身的兴衰的。现在，当世人出于对自身和人类社会安危的考量，开始忧虑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物种命运的改变和自然面貌的破败时，史家像其他众多学科的学者一样，也为之触动并作出反应。他们果敢地打破现代史学囿于片面的人类事务的藩篱，自觉地在历史长河中“加工三文鱼”，以此系统、深入地探索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关系的变迁，试图向世人揭示并帮助他们理解，一部三文鱼的历史，其实也是人类经历的一部分，而人类影响下的三文鱼的历史故事是何等的复杂；像三文鱼种群衰落之类的生态问题，由于很大程度上交织着文化、政治与经济的因素，因此又是多么的令人难以应对。^②显然，《加工三文鱼》这样的环境史著述，既不是在鱼类生物学或自然科学之内就三

①按环境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说法，对我们人类物种的大多数成员来说，“一战”时代最重要的主角，不是伍德罗·威尔逊抑或弗拉基米尔·列宁，而是西班牙流感病毒（Mark Cioc and Char Miller, “Alfred Crosby,” *Environmental History*, 14 (July 2009), p. 562.）。克罗斯比的代表作有《哥伦布大交换》、《生态扩张主义》、《美国被遗忘的传染病：1918年流感》、《病菌、种子和动物：生态史研究》等。关于克罗斯比的治史方法，参见刘文明：《从全球视野与生态视角来考察历史——克罗斯比治史方法初探》，《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1期。

②参见美国环境史学家威廉·克罗农为《加工三文鱼》一书所写的题为“为三文鱼代言”之序。William Cronon, “Foreword: Speaking for Salmon,” in Joseph E. Taylor, *Making Salmo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Northwest Fisheries Crisis*, ix-xi.

文鱼谈三文鱼——着重研究三文鱼等物种的习性或自然环境的变迁本身，也不只是在史学之外拾遗补缺——补上史学所曾缺少的自然主题，而是力图在根本上构建一种新的历史思维乃至历史本体观念。

概言之，环境史致力于研究人与自然的历史关系，以此看待并考察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人类所处、所做和所思的历史，从而将人类史与自然史连结起来，使历史成为完整的真正的整体史。这正如美国环境史学者威廉·克罗农所论述的，“毕竟，我们的任务远远不是试图逃出历史，进入自然，而是要将自然本身纳入人类历史长河之中。”^①在这样的历史中，人不仅是社会关系中的人，而且是生态系统中的人，人类社会本身即是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人类生态系统^②；自然并非孤立于人之外与人无关的客体，也不是人们脑海中含义不清的观念，而是既独立存在又不断被打上人的烙印并成为人的生存环境的物质

^①William Cronon, “The Us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Vol. 17, No. 3 (Fall 1993), p. 11.

^②人类生态系统 (human ecosystem)，又称社会生态系统或社会—自然生态系统，是以人与自然统一，经济、社会和自然复合为标志的一个概念，在现代涉及人类与其环境关系和相关问题处理的众多学科中得到使用。有环境史学者主张在环境史研究中借鉴人类生态系统概念。个人认为，这一主张是合理可取的。此外，还应认识到，在环境史研究中借鉴人类生态系统概念的意义，主要并非为史学增添一个新概念，而是这一新概念可以启发我们更好地思考诸如民族、国家、社会、文明等史学中固有概念的内涵。或许可以说，史学中这些固有概念所指代的实体本身即可被界定为经济、社会和自然复合的人类生态系统。关于人类生态系统的性质及其内涵，参见帕斯卡·佩雷斯和大卫·巴滕主编的《认识复杂世界的复杂科学：对人类生态系统的探索》(Pascal Perez and David Batten, ed., *Complex Science for a Complex World: Exploring Human Ecosystems with Agents*, Canberra ACT 0200, Australia: ANU E Press, 2006)。

和生命世界。这样，历史的本体，即是为满足生存、发展需要的现实的人，与自然界不断进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所作所为体现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及其交织的人与人的争端，这一矛盾运动引起的自然变迁和生态后果，以及这种后果对人类社会的反向作用等，成为了环境史研究者的历史探索的聚焦点。

二

环境史提升了人们关于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之关系的认识，以及在这一认识指导下的史学实践的意义。这突出地表现在历史动力观念的变革上。

诚然，诸如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人类活动引起的自然环境的变化及其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人类对自然界如何运动的思考等等，是人类思想史和学术史中存在已久的主题。美国的地理学家克拉伦斯·格拉肯（Clarence J. Glacken, 1909—1989）就曾指出，在一部西方思想的历史中，人们不断追问的三个问题所涉及的，即是可居住的地球和人类与它的关联。^①至

^①格拉肯对这三个问题的表述是：“地球，这一显然适于人类及其他有机生命生存的环境，是有目的地加以创造的吗？地球上的气候、地形、大陆格局等等是否会对个体的道德秉性及社会属性产生影响，是否在塑造人类文化的特征和性质上产生过影响？在人类长期占有地球的过程中，他是以何种方式将地球从假定的原始状态改变过来的？”他还将人们自古希腊时代以来反复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的主张概括为三种观念，即神创地球的观念、环境影响的观念以及人类作为一种地理营力的观念。（Clarence J. Glacken, *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Nature and Culture in Western Thought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vii.）

于“环境史”概念本身，有学者认为，到20世纪70年代初，它一直是地理学家和考古学家在论述自然环境中第四纪变迁和史前变迁时所惯用的一个术语。^①不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史家着力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变迁，并以这一视角看待历史发展时，他们不仅凭借活跃的理论思维，而且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重新诠释和分析了自然的存在及其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由此，他们认识到，自然是一种客观、实在的力量，自古以来它与人类一起共同塑造着历史，并推动着历史的运动。这可以理解为环境史在历史动力观念上所带来的新变化。而这又是以人们对环境史作为一门历史何以兴起的察识为前提的。

对于这一问题，环境史研究的资深学者、美国的历史学家J.唐纳德·休斯（J. Donald Hughes, 1932—）在比较环境史和旧史学时作了颇为全面的论述。他说道，正如劳工的历史、妇女的历史、种族的历史等等大都是社会和政治运动的产物，“环境史的基础也与那些资源保护主义者和环保运动绞缠在一起”，因此，可以将环境史视为历史学进步的一部分；这一进步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历史学者已认识到伦理的扩展在承认移民、妇女和从前的奴隶的作用后，“已在考虑树木是否应当拥有权利”。休斯在提示这一观点的参考来源时，附注了罗德里克·纳什的《完善美国的革命：伦理的扩展和新环境主义》一文；^②他自己则认识到，动物和树木以及地球本身在力量的金字塔中位居最底层，并且是支撑这一结构的石阶。于是，他

^①参见Alan C. Hamilto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East Africa: A Study of Quaternary*, Lond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2.

^②Roderick Nash, Rounding Out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Ethical Extension and the New Environmentalism, in Michael Tobias, ed., *Deep Ecology*, San Diego, CA: Avant Books, 1985.

特别强调，“将环境史简单地看成是历史学科内部进展的一部分，则是严重的误解。自然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严格而论，它是一切力量的源泉……没有它，人类的努力就不起作用。”^①在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环境史研究者有关自然的地位及其与历史关联的新认识。他们在认可自然的内在价值的前提下，认识到自然与人类一样具有塑造历史的力量，而历史运动，包括环境史的兴起这场当代史学变革本身，即是由自然的影响和人类的努力共同推动的。

更为重要的是，环境史研究者对自然之于历史作用的重视，并没有停留在抽象论说的层面。他们通过具体、深入的研究，分析、揭示自古至今自然与人类一起塑造历史、推动历史的事实，因而在人类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以及对自然的书写中作出了新的切实的贡献。^②譬如，美国环境史学者斯蒂芬·派因（一译派恩）以“火”为主题所做的系统研究和分析，涉及地球上火与人类的整个历史，以及人类与火相互作用的许多方式。其中包括《火之简史》^③在内的《火的轮回》丛

①[美]J.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第13页。

②对于环境史在这方面的作用，可参见高国荣：《环境史及其对自然的重新书写》，《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1辑，第124—133页。

③[美]斯蒂芬·J·派因：《火之简史》，梅雪芹等译，陈蓉霞译校，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书7本^①，充分揭示了火这一自然的氧化反应如何在与人类共同演化的过程中，塑造了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及世界各地的文化史。其实，与派因著述同时或前后，以自然要素或人类事务为题材，分析自然与人类共同塑造历史的成果，是层出不穷的。1992年问世的印度环境史研究者拉马昌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 1958—）与生态学家马达夫·加吉尔合著的《这片开裂的土地：印度生态史》，就分析了水、森林和矿物作为关系到生产乃至生存的自然资源，在印度环保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②上文提到的泰勒于1999年出版的《加工三文鱼》也是这方面的佳作。

当然，由于环境史研究者是一个学科背景和个人兴趣多样化的群体，他们在主题选择和研究路径上有着多种多样的表现。并且，依据时空单位和问题考量的不同，他们对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中哪一方更具支配性的认识有着各自的主张和侧重点，甚至存在不小的差异。譬如，休斯以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 1937—）的研究和主张作为接近环境决定论

①其他6本分别是：《美国的火：野外和乡村之火的文化史》（*Fire in America: A Cultural History of Wildland and Rural Fire*, 1982），《冰天雪地：南极之旅》（*The Ice: A Journey to Antarctica*, 1986），《燃烧灌木丛：澳大利亚用火的历史》（*Burning Bush: A Fire History of Australia*, 1991），《世界之火：地球上的火文化》（*World Fire: The Culture of Fire on Earth*, 1995），《灶神之火：火所述说的欧洲环境史》（*Vestal Fire: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Told Through Fire, of Europe and Europe's Encounter with the World*, 1997），以及《令人生畏的光芒：加拿大用火的历史》（*Awful Splendour: A Fire History of Canada*, 2007）。

②Madhav Gadgil and Ramachandra Guha, *This Fissured Land: An Ecological History of In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①一端的代表，以威廉·克罗农的研究和主张作为文化决定论 (Cultural Determinism)^②的代表。^③细究起来，他的这一区分未免失之偏颇。

从戴蒙德的相关研究来看，这位生理学与膜生物物理学出身，又有着医学、人类学和地理学背景的美国环境史学者，在考量“历史进程的地区差异”这一世界史的基本事实并分析其由来问题时，的确突出了环境因素的作用，这体现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④一书之中。在这里，戴蒙德着力思考现代世界各地的差异问题，并这样问道：“为什么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不是某种别的方式呢？”^⑤他又将这一问题表述为“为什么在不同的大陆上人类以如此不同的速度发展呢？”他认为，“这种速度上的差异就构成了历史的最广泛的模式”，这也是他所确定的这本书的主题^⑥。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则是：“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

①国内学者通常称之为“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一种认为人类个体的身心特征以及个体组成的社会行为和文化等人文现象受自然环境要素，特别是气候条件支配的观点，又以“气候决定论”或“地理决定论”著称。

②这里所说的文化决定论，指的是一种与环境决定论相对立的主张；该主张认为，人类通过思想、社会化以及所有形式的信息流通，创造了自身的实际处境。

③J.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第115页。

④[美]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廷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

⑤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前言”，第4页。

⑥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前言”，第5页。

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①他之所以认为原因在于“民族环境的差异”^②，是因为他心目中有一个思考的焦点，也就是那种从生物学或遗传学上强调民族之间的差异，认为欧洲人比非洲人，尤其是澳大利亚土著聪明的种族主义解释。并且，也是为了扭转他所认为的今天的历史学家过分忽略环境因素对社会发展之影响的现状。所以，他试图充分利用科学所提供的新知识，以新的眼光来看待上述问题。他还认为，在这一问题上要区分近似原因和终极原因，并提出了关键的几组环境差异^③。之后，他又出版了《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一书^④，进一步论证了人类在面对问题时，如何作出了不同的应对或选择，以至经历了不同的命运。

显然，戴蒙德所思考和探究的“各大陆民族长期历史之间的显著差异”，是一个宏大的历史问题。而他从环境差异的角度做出解释，则是试图建构一种必要的综合的历史思考模式。可以说，戴蒙德很好地实现了自己的研究目标。至于克罗农，一位研究美国史出身，并有着英国城市和经济史背景的美国环境史研究者，我们对其观点的了解，显然不应局限于休斯列举的由其主编的论文集^⑤，还应着重研读其公认的代表作，它们

①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前言”，第16页。

②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史学家杜佑在《通典·边防典》中已提出类似的见解。

③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后记”，第436-439页。

④[美]贾雷德·戴蒙德：《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江滢、叶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

⑤William Cronon ed., *Uncommon Ground: Toward Reinventing Nature*, New York: W. W. Norton, 1995.